

《官话和合本圣经》的成功翻译 及其对中国新文学的影响

刘丽霞

(济南大学 文学院 山东 济南 250022)

摘要:《官话和合本圣经》的翻译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是一批对中文颇有造诣的传教士及其华人助手的合作结晶。汉译白话圣经目的虽不在文学,而在于宣传宗教,可是因《圣经》本身是极佳的文学作品,加上其成功的白话语言,因而在客观上对中国新文学的发轫起到了积极的借鉴和示范作用。这一点,得到了包括周作人在内的新文学先驱的肯定。随着新文学的发展,圣经中的意象、语言、精神及文体也在诸多作家作品中得到了体现,从而为新文学提供了丰富的异质资源。

关键词:《官话和合本圣经》 新文学 影响

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853(2005)03-089-07

利用文学对民众的强大感染力,加强基督教事业的宣传与发展,历来是基督教重要的传教手段之一。基督教教义典籍《圣经》之所以能流传久远、深入人心,与其在文学上的经典性是密不可分的;而1919年《官话和合本圣经》的成功翻译,不仅对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对中国新文学的发轫起到了积极的促动作用,并为发展中的新文学提供了新的内容和精神,在某些文体上也为新文学作家所借鉴。

一、《官话和合本圣经》的成功翻译

《圣经》不仅是所有信奉耶稣基督为救主的人们的宗教经典,也是世界文化和知识宝库中的一部杰作,是迄今为止在全世界印数最多、流行最广、翻译语种最多的一部书。汉译《圣经》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基督教传入中国后,便出现了许多《圣经》的中译本。最早的《圣经》中译本可追溯到7世纪的“景教本”,此后随着传教的需要,不断有各种译本出现。19世纪下半叶,汉译《圣经》开始有“浅文理”和“官话”译本。“‘浅文理’是‘句式归于传统记略,而语汇较为常用的文体’(Britton 1933:57)。所以它在古典语言(传教士所称之‘深文理’)与白话之间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1](p22-23)}。官话(今日称国语或普通话)是清末中国朝廷及各地官员使用的语言,也是中国全境日常使用的语言。为了切合广大群众的需要,传教士便尝试用这种普及的语言来翻译圣经。

1890年在上海召开的宣教大会,决定英美新教传教士成立三个委员会分头负责《圣经》深文理、浅文理与官话和合译本三种中文和合版本的翻译工作。其中官话本于1891年开始,《新约》汉译由狄考文负责,于1907年出版。《旧约》汉译由富善负责,1919年初与新约合订出版官话和合译本《新旧约全书》,有“神”和“上帝”两种版本。该译本面世不到十年,销售量已超过了其他所有中文译本圣经并逐渐取代了其他中译本,为中国教会普遍接受,这也是外国传教士在华集体翻译的最后一版中文《圣经》。其中

收稿日期:2005-05-12

作者简介:刘丽霞,女,1972年生,山东莱西人。济南大学文学院讲师,博士。

“和合”二字“不是指着中文说的,而是指着新教各教派对《圣经》中一些关键的词的正确译法及人名的标准音译达成的一致意见而说的”^{[1](p22-23)}。

可以说,《官话和合本圣经》在翻译上基本达到了“信、达、雅”的较高成就。这个成就的取得不是偶然的,首先值得一提的是它对原文意义的忠实。而这是与它所采用的白话语言息息相关的。“采用高深的文言译经,容易掉进儒家常用的一套词语和典故里去,而这是必须避免的,因为沿用儒学的术语有时候非但无法阐明基督教的真理,甚至可能曲解了它的含义。”^{[2](p140)}《圣经》的汉译在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以佛老释耶”和“以儒释耶”两种模式,前者如早期的景教文典(如将上帝译为“佛”,“受洗”译为“受戒”);后者如明末清初耶稣会士利玛窦等人的“合儒”做法。为了反拨这种做法,后来的译经活动都强调对于圣经原文的忠实。但对于文理译本特别是深文理译本来说,由于文言语句中儒教涵义的渗透,语言本身造成了意义传达的障碍。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白话文的出现使原有传统的语言载体发生了断裂,从而为异质文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诠释空间。因而汉语语境与圣经文本之间的鲜明的异质性,也正是在‘白话译经’的文本中才真正得以彰显。”^{[2](p40)}

有了白话语言仅仅是成功的第一步,其次还要有熟练掌握白话语言的翻译者。我们先来看两位负责人的语言能力:《新约》汉译的负责人狄考文(Calvin Mateer, 1836-1908)是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在中国近代传教史上和教育史上可谓大名鼎鼎。此外,他的汉语水平也非常高,他编的《北平官话教程:以方言为基础》是当时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首选的汉语入门书之一。《旧约》汉译的负责人富善是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在中文方面也有深厚造诣。1891年富善累积了丰富的中文知识,出版了一本《中英袖珍字典》,内里包括10,400个汉字。另外又出版了一本《官话特性研究》,更包罗了39,000句汉语。这两本书成为当时西方宣教士和各国外交人员学习普通话必备参考书。

除了两位负责人以外,其他参与翻译的传教士如白汉理、杨格非、文书田、海格思、伍兹、鲍康宁、仲钧安及鹿依士等人也都无一不是既精通圣经原文,又真正通晓中文的。译经工作历时28年,到1918年才正式完成。在1919年出版时,原来的译经委员,只有富善一人得看见这本中文和合译本圣经的问世,他也已82岁的高龄了。

即使有了这样一批对中文颇有造诣的传教士,《官话和合本圣经》的翻译仍然是有很多困难的。“当时译经的困难,超过我们今天所能想象的。那时,还没听说有拼音这回事,更没有所谓国语。除了康熙字典之外,没有方便辑成的词书如辞源,辞海可查,可能要索求五方元音,圣经中有关农事农具的用语,则要查日用庄稼杂字之类的僻杂小书。这当然不容易而缺乏标准。在此之外,就得问来自中国各地的助手们。”^{[2](p40)}因此可以说,1919年出版的《官话和合本圣经》,是西方传教士和华人助手合作的成果。这些华人一般都是传教士的语言教师或抄录员。有一个掌故可以让我们更直观地了解双方在翻译中的工作关系以及超越文化樊篱的工作态度:“所有或几乎所有希腊原文中的比喻都破天荒地出现在中文译本中。像‘穿上新人’、‘披戴基督’就是大胆译出的比喻。从前的译本都是意译这类比喻,或者照译但留下小注。但是这次委员会讨论中有一个中国学者突然插了一句:‘你们以为我们中国人不懂得欣赏这些比喻吗?这在我们的书里随处可见,新的比喻必会受到欢迎的。’事情就这么定了。”^[1]当然,我们不能过分强调中国助手的作用,因为“不论如何,直至二十年代末,《圣经》的翻译与定稿的大权还是掌握在传教士手中的”,直到“二十年代后期至三十年代,一批中国神学家和教士登上了历史舞台,其中有些人做翻译是游刃有余的,传教士们遂结束了译经事业”^[1]。

二、“欧化的国语的文学”:白话文的适时范本

这本包含诸多人心血的卓越的汉译圣经出版以后,深受教会乃至教外一些人士的欢迎。当然,因为当时客观环境的困难,并不能完全达到“国语”化的标准,有些区域性的语词,对非北方人较难理解。不过,这类的方言,在圣经中并不多。从翻译角度而言,这无疑是一本成功之作。

汉译白话圣经目的虽不在文学,而在于宣传宗教,可是因《圣经》本身是极佳的文学书,特别是它成功的白话文翻译,为五四新文学的发轫提供了良好的范本意义和借鉴价值。

《官话和合本圣经》的最后定本是1919年2月印行的,对中国文学的现代语言转型有着不容忽视的意义。周作人在1921年发表的《圣书与中国文学》^[3]一文中谈及了白话《圣经》汉译本对新文学语言建设上的积极促进作用。身为新文学先驱人物的周作人的意见,无疑值得我们重视。由于中国学者最早的汉译《圣经》从1922年才开始出现(萧静山于1922年出版其《新约全书》译本),所以周作人此处所指的应该是传教士的译本。而通过查考其中引文,我们则可以肯定,周作人所说的译本就是1919年的《官话和合本圣经》。

作为中文圣经翻译中运用白话文最成功的尝试,《官话和合本圣经》与力废文言大倡白话的“文学革命”几乎同时出现,并被周作人视为新语言创作的典范,不是一种偶然。周作人在该文中认为,文学革命的主张时已提出两三年且在社会上已经占了优势,但破坏之后的建设实绩却“几乎没有”,究其原因,“思想未成熟,固然是一个原因,没有适当的言词可以表现思想,也是一个重大的障害”。周作人在经过一番比较之后,得出圣经汉译本之于新文学语言建设的借鉴意义:

前代虽有几种语录说部杂剧流传到今,也可以备考,但想用了来表现稍为优美精密的思想,还是不足。有人主张“文学的国语”或主张欧化的白话,所说都很有理;只是这种理想的言语不是急切能够造成的,须经过多少研究与试验,才能约略成一个基础;求“三年之艾”去救“七年之病”,本来也还算不得晚,不过我们总还想他好的快点。这个疗法,我近来在圣书译本里寻到,因为他真是经过多少研究与试验的欧化的文学的国语,可以供我们参考与取法。……白话的译本实在很好,在文学上也有很大的价值;我们虽然不能决怎样最好,指定一种尽美的模范,但可以说在现今是少见的好的白话文,这译本的目的本在宗教的一面,文学上未必有意注重,然而因了他慎重诚实的译法,原作的文学趣味保存的很多,所以也使译文的文学价值增高了。

……

由上可见,周作人所肯定的语言是“欧化的文学的国语”,而这正是和合本圣经所具备的,因此可供“参考和取法”。显然,这个关键词中包含了三个义项,即“欧化”、“文学”和“国语”。“国语”自不待言;文学性作为《圣经》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有目共睹的。在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圣经》无疑是第一流的杰作。关于圣经文学的伟大性、圣经文学的特质以及圣经对于后世文学的影响,基督教文学研究专家朱维之在他那本被称作“中国基督教文学史中的第一部参考书”(刘廷芳语,见《基督教与文学·序》)的《基督教与文学》(初版于1941年)中,进行了详细精辟的论述。朱维之认为,伟大的作品应具有如下条件:第一是要有感人的力量;第二是要抒写感情,鼓荡感情;第三是要有活泼的想象;第四是形式方面的美丽。而《圣经》,在这几个方面都堪称典范。《官话和合本圣经》尽管不能说是尽善尽美,但仍在整体上很好地传达出圣经文学的艺术性,正如周作人所说:“这译本的目的本在宗教的一面,文学上未必有意注重,然而因了他慎重诚实的译法,原作的文学趣味保存的很多,所以也使译文的文学价值增高了。”夏晓虹曾谈到晚清的白话文运动虽然为五四白话文学的诞生做了准备,但晚清作者的白话文因为其倡导者的观念而缺乏美质,因而不具备现代文学的质素:“白话作文既然以宣传、教育为重要用途,文章便不必写得有文采,‘辞达而已’于是成为引述最多的警言。白话文运动的理论家还经常指责文言以‘外美’掩其‘陋质’,‘静言思之,未有不丑态立见者’。此语固然深中肯綮,但晚清作者因此反其道而行之,完全放弃了对文学美感的追求,则是十分遗憾的事情。”^[4](p120-121)而传教士所翻译的白话圣经,之所以能与文学革命发生贡献性的关联,恰恰在这方面具备了必要的条件。

似乎有疑义的是“欧化”这一义项。其实从1930年代左翼作家提倡大众化运动一直到1980年代,关于语言的欧化都是一个引起争论并遭到批评的问题。这是一个需要辩证看待的问题。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曾自觉地学习欧化语言,并把它与学习西方的思维方式乃至文化精神相联系。中国传统的语言比较短,且传达主要靠意会,虽然读来容易、内涵丰富、富于张力,但缺乏逻辑的清晰性和意义的明晰性。西方语言则有一整套逻辑严密的语法体系,大句子里面套有小句子。这种结构复杂的语言范式,实际上反映了思维方式的严密性。鲁迅在《关于翻译的通信》里,曾谈到翻译的目的,“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

在输入新的表现法”。^{[5](p382)}因为在他看来,中国的语言太贫乏,太不精密,而语法的不精密,就证明了思路的不精密。所以他认为中国现代语言应该引进大量新的成分,包括欧化的语法结构。作为中国新文学的第一篇白话小说,鲁迅的《狂人日记》在语言上就体现了不同于传统语言风格的欧化特点。陈思和在分析《狂人日记》时专门提到了这个问题,认为鲁迅的语言在中国传统语言的生动性多义性的基础上,融会了西方语言的精确性,开创了一种可称之为“欧化语”的新语言,并肯定了鲁迅的欧化语言在表达其深刻思想上的积极意义。^{[6](p67)}

笔者认为,语言适度的欧化是值得肯定的,因为它确实有助于表达较为精密、深邃和复杂的思想,应该否定的是那种食洋不化的令人读来云山雾罩的所谓欧化。而且,较之于新文学伊始,今天语言的欧化已经渗透到我们的文学语言中,并被自然而然地接受了。在这个意义上,周作人肯定《官话和合本圣经》语言的欧化就容易理解了。周作人不但肯定《官话和合本圣经》语言的欧化,说它“是经过多少研究与试验的欧化的文学的国语,可以供我们参考与取法”,而且在《圣书与中国文学》中肯定了它的首创性:“我记得从前有人反对新文学,说这些文章并不能算新,因为都是从‘马太福音’出来的;当时觉得他的话很是可笑,现在想起来反要佩服他的先觉:《马太福音》的确是中国最早的欧化的文学的国语,我又预计他与新文学的前途有极深的关系。”《马太福音》作为《官话和合本圣经》中《新约》的第一篇,1906年便已问世,虽然到1919年最后全书出版时文字有所改动,如加强了文字的流畅性,但仍是译文准确的白话文,所以周作人称之为“中国最早的欧化的文学的国语”。若在此意义上,我们似乎可以说,《狂人日记》的语言并不能算是对“欧化语”的“开创”。

《官话和合本圣经》除了语言之外,在形式上还有一点是周作人在《圣书与中国文学》中特别肯定的,即标点符号的应用所体现出的慎重诚实的翻译精神,以及对于新文学翻译的示范意义:

……人地名的单复线,句读的尖点圆点及小圈,在中国总算是原有的东西;引证话前后的双钩的引号,申明话前后的括弓的解号,都是新加入的记号。至于字旁小点的用法,那便更可佩服;他的用处据《圣书》的凡例上说,“是指明原文没有此字,必须加上才清楚,这都是叫原文的意思更显明”。

我们译书的时候,原不必同经典考释的那样严密,使艺术的自由发展太受拘束,但是没有这样慎重诚实的精神;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从《圣书》译本得到一个极大的教训。

总之,对于力废文言大倡白话的“文学革命”而言,《官话和合本圣经》成了适时的范本。值得一提的是,白话文运动的领袖胡适曾经就《官话圣经》与白话文运动的关系有过似乎与此相反的说法:“照我所知,《官话圣经》在预备白话文为现代文字媒介的事情上,没有过丝毫的功绩。在新文学运动初年的一切辩驳文字里面,从没有提出过这些译本。那被提倡来做文字媒介的白话是伟大的小说的白话。这小说的白话也就是翻译圣经者为他们的《官话圣经》取来做文字媒介的来源。”^{[2](p43)}细细探究,这段话与周作人的说法并不是完全相反。因为胡适所指仅在“白话”这一层面上,而周作人的说法则强调1919年《官话和合本圣经》在“欧化”、“文学”与“国语”三个层面的综合因素对新文学所提供的范本意义。所以,若仅看白话文一个层面,胡适所说自然不无道理,即五四白话文学受到了此前白话文学传统的影响;但从三个层面综合考察具有现代意义的白话文学,周作人的说法也是成立的。

三、新的文学“作风”与“实质”:新文学发展的异质资源

周作人将白话圣经视为新文学初期的文学翻译乃至白话创作的范本,无独有偶,1940年,基督教文学的研究专家朱维之在《中国文学底宗教背景——一个鸟瞰》^[7]一文中,也视《官话和合本圣经》为新文学运动的先驱,且赋予新文学以新的内容和实质:

《圣经》底“官话和合”译本,是在新文学运动初发生时完工的,它底影响不仅是用白话文完成一部最初的“国语的文学”;并且给新时代青年以新的文学作风,新的文学实质。

朱维之在文中提到:五四运动以后,青年文学者如饥似渴地读起外来作品,《圣经》也渐渐被他们注意到了。许多青年作家喜欢用圣经的新词、新观念。“乐园”、“天使”、“灰色马”、“末日”、“十字架”、“洗

礼”、“灵魂”等新词络绎于行间,圣经中的典故如失乐园、出埃及、浪子回家、犹大卖友等也常被采用。

考察新文学作家的创作,我们会发现,朱维之所提到的现象的确大量存在。不仅在一些基督徒作家的作品中,《圣经》的意象、观念和精神得到了充分彰显,就是在一些对基督教感兴趣的非基督徒作家那里,《圣经》的影响也是很明显的。概括起来,《圣经》作为一种异质资源,在新文学中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一是对《圣经》语言和意象的引入和移植;二是对《圣经》所体现的基督精神的认同与体现;三是对《圣经》文体的借鉴和吸收。前两点前人所谈较多,故略论。

(一)对《圣经》语言和意象的引入和移植

新文学作家对《圣经》语言和意象大量的引入和移植,丰富了文学的表现能力和意义空间,也形成了不同于传统话语的语言风格与审美意识。除了上面朱维之所提到的那些圣经语言和意象之外,其他的还有“上帝”、“耶稣”、“光”、“爱”、“圣母”、“圣子”、“天国”、“永生”、“圣诞”、“福音”、“亚当”、“夏娃”、“禁果”、“受难”、“魔鬼”、“沉沦”、“悔改”、“安息”、“牧者”、“羔羊”、“新生”等。冰心的创作可谓这方面的一个代表,其诗集《繁星》中多次使用“光”的意象,如星光、月光、阳光、霞光、灯光、烛光。“光”在《圣经》当中是一个核心概念。《旧约·创世纪》第一章中记载,上帝创造万物之前,先创造了光;《新约·约翰福音》第一章中则强调真理之光之于人的重要性。耶稣在世时教导他的门徒说:“你们是世上的光”(《马太福音》5:14),冰心将作品置于一个充满光的世界里,从而营造了一个温馨、理想、美好的艺术氛围。

新文学作家对《圣经》语言和意象大量的引入和移植,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现象,就是对《圣经》原文的引用。这种引文或者置于文前,或者放入文中,或者附于文后,用来表达某种引申或象征的意义。基督徒作家们的创作,对《圣经》原文的引用自是熟稔,如许地山的小说《缀网劳蛛》中,多次引用《圣经》原文刻画主人公尚洁的爱心与信心,如“不要为明日自夸,因为一日要生何事,你尚且不能知道”(《箴言》27:1);“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马太福音》5:10)。张资平的小说《上帝的儿女们》则引用了16段《圣经》,借以凸显教会人士信仰行为与《圣经》教训之间的反差,从而起到鲜明的讽刺效果。非基督徒作家们的创作中,对《圣经》原文的引用也很普遍。如曹禺戏剧《日出》引用了7段《圣经》原文,既代序言,又起象征的作用。巴金的小说《生命》、《罪与罚》、《田惠世》中也多处引用《圣经》。

(二)对《圣经》所体现的基督精神的认同与体现

对《圣经》所体现的基督精神的认同与体现,在许多作家那里都可以找到。试举几例加以说明:

冰心《一个不重要的兵丁》中的福和,虽然是一个没有职位、时常遭受亲人冷淡和他人嘲笑鞭打的小人物,但他始终保持着一颗喜乐之心,怜悯之心,最后因为救护一个被打的孩子受重伤而死。“他是一个不重要的军人,没有下半旗,也没有什么别的纪念,只是从册上勾去他的名字。然而这营里,普遍的从长官到他的同伴,有两三天,心灵里只是凄黯烦闷,如同羊群失了牧人一般。”《圣经》中将基督与信徒的关系比喻为牧人与羊群,由此可见冰心有意将福和塑造为一个富有基督精神的现实化人格形象。

许地山《缀网劳蛛》中的尚洁,面对受伤的窃贼,拿出基督“爱仇敌”的情怀为之疗伤,因此被丈夫怀疑并被刺伤。在被丈夫和教会遗弃之后,她依然有着一颗饶恕别人的心。靠着莫大的爱心和信心,最终赢得丈夫的悔改,谣言也不攻自破。

老舍的《黑白李》则鲜明地体现了基督的舍己牺牲精神。黑李读了《四福音书》之后,“总是劝人为别人牺牲”。当他猜出白李有个极具危险性的计划、怕连累他时,他决意要去为白李而牺牲。于是,他将眉上的黑痣烧去,代替白李投身工运,最后被捕献身了。

(三)对《圣经》文体的借鉴和吸收

新文学对《圣经》文体的借鉴和吸收,其实也是周作人在《圣书与中国文学》一文中的希望:“希伯来古文学里的那些优美的牧歌(Eidyllid=Idylls)及恋爱诗等,在中国本来很少见,当然可以希望他帮助中国的新兴文学,衍生出一种新体。预言书派的抒情诗,虽然在现今未必有发达的机会,但拿出来和《离骚》等比较,也有许多可以参照发明的地方。……”周作人的希望,随着新文学的发展,可以说得到了一些实现。

周作人所说的“恋爱诗”是指《圣经》中的《雅歌》。《雅歌》在《圣经》66卷书中是很独特的一卷,因为其中心是讲男女之间爱情的欢愉和相思的苦楚。此卷书希伯来原文用书前的标题 sir hassirim 为书名,

意思是“歌中之歌”，即最好且最美丽的诗歌。“sir”通常指口唱的欢悦歌曲，说明《雅歌》中的歌不但美丽，且富喜乐情怀。中文称之为《雅歌》，可能与《诗经》有关。《诗经》中的《风》和《雅》，其中不少是描写农家生活、男女爱情之作。这些作品所描绘的思妇怀人，吉士求爱，桑间陌上，男女相与咏歌，与《雅歌》的葡萄园中、苹果树下男女相悦之咏唱极为相似。“雅”也有正的意思，说明虽为男女相悦之歌，但却是孔子所说的“思无邪”之作。传统认为此书是所罗门所作或后人为他而作，以志他和牧羊女书拉密之间的爱情。自成为圣经正典后，释经家也赋予了《雅歌》多种寓意的解释。^{[8](p978)}

周作人对《雅歌》的文学成就是很推崇的，他认为：“《雅歌》的价值全是文学上的，因为他本是恋爱歌集，那些宗教的解释，都是后人附加上去的了。”^[9]现代作家中喜爱《雅歌》的还有不少人，他们还借鉴《雅歌》写诗作文。许地山曾重译《雅歌》，发表在《生命杂志》上。沈从文的小说《月下》在表现爱情时引用了《雅歌》中的名句：“求你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带在你臂上如戳记”，我念诵着《雅歌》来希望你，我的好人。”《我喜欢你》则模仿《雅歌》的善用譬喻：“你的聪明像一只鹿/你的别的许多德性又像一匹羊/我愿意来同羊温存/又担心鹿因此受了虚惊/故在你面前只得学成如此沉默(几乎近于抑郁了的沉默)/你怎么能知?”冰心也曾模仿《雅歌》赞美她中学时代美丽和藹的老师“T”：“那时我们在圣经班里，正读着《所罗门雅歌》，我便模仿《雅歌》笔调，写了些赞美T女士的句子，在英文练习薄的后面，一页一页的写下叠起。积了有十几篇，既不敢给人看，又不忍毁去。”^[10]

另外，新文学中的赞美体、祈祷体等文学样式，也是受《圣经》有关文体影响而产生的新抒情文体。

赞美体文学在《圣经》中以《诗篇》表现得最为突出。《诗篇》收纳了精选的诗歌150篇，其中许多是赞美体的佳作。《圣经》之后，基督教文学中出现了大量的赞美诗(亦称圣歌)，且不乏名篇。中国的赞美诗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翻译的，一类是创作的。就已有的赞美诗而言，翻译的远多于创作的。1936年《普天颂赞》的问世，标志着中国教会编纂赞美诗的新纪元，出版后成为国内最负盛名、销路最广的一本赞美诗集。

中国现代著名作家许地山在燕京大学期间，曾参加教会活动，并参与基督教文字工作。其中《神佑中华歌》(1935)是他按着英国国歌的格律填词而作。在编辑《普天颂赞》时，许地山以他所创作的这首诗寄投，经杨荫浏谱了中国曲调，调名《美地》，于是这首爱国诗歌也就有了新的形式和乐谱，表达了中国信徒的爱国热诚：

神佑中华歌

- (一)神明选择赐与，一片荆原棘地，我祖开辟；
子孙继续努力，瘦瘠变成膏腴，使我衣食无亏，生活顺利。
- (二)旧邦文化虽有，许多消灭已久，惟我独留；
求神永远庇佑，赐我一切成就，使我永远享受，平等自由。
- (三)恳求加意护庇，天灾人患，永离中华美地；
民众乐业安居，到处生产丰裕，信仰、道德、智慧，向上不息。
- (阿门)^{[11](p259-296)}

祈祷体文学(含诗歌与散文)在《圣经》中是很多的，因为祈祷在宗教崇拜中是非常重要的活动。祈祷辞常以诗歌的形式传达出来，《圣经·诗篇》中有很多祈祷诗，占半数之多，且是合乐协律的，有些还注明所用调名。如第22篇，注明“大卫的诗，交于伶长。调用朝鹿”。这是一首著名的祈祷诗，表达了诗人在痛苦煎熬中向神呼求的心境。《圣经》之后的基督教文学中，也产生了许多祈祷诗。其中有合乐的，也有不合乐的，后者在数量上更多。中国基督教文学中亦不乏祈祷诗，如冰心的《晚祷(一)》：“浓浓的树影/做成帐幕/绒绒的草坡/便是祭坛——/慈怜的月/穿过密叶/照见了虔诚静寂的面庞||四无人声/严静的天空下/我深深叩拜——/万能的上帝/求你丝丝的织了明月的光辉/作我智慧的衣裳/庄严的冠冕/我要穿着它/温柔地沈静地酬应众生||烦恼和困难/在你的恩光中/一齐抛弃/只刚强自己/保守自己/永远在你座前/作圣洁的女儿/光明的使者/赞美大灵||四无人声/严静的天空下/只慈怜的月/照着虔诚静寂的面庞。”^{[12](p26-28)}其他如梁宗岱的《晚祷》、闻一多的《祈祷》、穆旦的《祈神二章》以及王独清的《圣母像前》等都是祈祷诗体的风格。

用散文诗的形式写成的祷辞更为普遍。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莫过于赵紫宸,他在《生命月刊》、《真理与生命》等刊物上发表了大量的祷文。赵紫宸被称作“神学家诗人”,他的祷文有很浓的诗意,如关于复活节的祷文:“生命的主,慈悲的天父,你将自己的生命赐给我们;因为我们是你爱的海里掀起的波浪,是你爱的藤上结实的葡萄,是你爱的杯中漫溢的新酒。你的爱永无穷尽,我们相信,凡是属于你的,永不至于消灭,永不至于毁坏。求你使我们大胆的爱你爱人。……”^[13]

由于成功的翻译,《官话和合本圣经》对新文学的发轫起到了催化、先驱和示范的作用,同时白话文在文学领域的胜利也提高了白话圣经的地位,二者之间呈现为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正因为此,五四时期,作为文学领袖的周作人高度评价《官话和合本圣经》对新文学的示范作用,而他对《官话和合本圣经》所做出的预测——“我又预计他与中国新文学的前途有极深的关系”——也通过它在诸多现代作家那里留下或深或浅的印迹加以证实。当然,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客观而辩证地看待白话圣经与新文学之间的关系。由于20世纪20年代爆发的“非基督教运动”,特别是随着新文学的政治化与功利化色彩的加深,以《官话和合本圣经》为代表的基督教文化对新文学的影响受到挫折。因此,对《官话和合本圣经》之于中国新文学演变中的影响,不能给予过高的估计。

参考文献:

- [1][美]魏贞恺.和合本圣经与新文学运动[M].吴恩扬译.金陵神学志(复),1995.
- [2]许牧世.经与译经[M].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83年,第140页.转引自杨慧林.圣经“和合本”的诠释学意义[M].梁工,卢龙光编选.圣经与文学阐释[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 [3]周作人.圣书与中国文学[J].小说月报.1921(1).
- [4]夏晓虹.晚清社会与文化[M].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 [5]鲁迅全集[C].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 [6]陈思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 [7]金陵神学志[J].1940,12,10.
- [8]圣经启导本[M].中国基督教协会,1996.
- [9]周作人.《旧约》与恋爱诗[A].知堂书话[M].岳麓书社,1986.
- [10]冰心.我的老师[M].《冰心全集》第3卷,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
- [11]王神荫.赞美诗(新编)史话[M].中国基督教协会,1993.
- [12]冰心诗集[C].开明书店,1943.
- [13]赵紫宸.祷文[J].真理与生命,第4卷第18期.

责任编辑:冬 冰

Successful Translation of *The Combined Bible and the Bible in Mandarin Chinese* and Its Impact on China's New Literature

Liu Lixia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Jinan Univ., 250022, Jinan, Shandong)

Abstract: The translation of *The Combined Bible and the Bible in Mandarin Chinese*, a great accomplishment, is a collaboration between a group of foreign missionaries well versed in Chinese and their Chinese aides. The translation of the *Bible* in vernacular Chinese does not aim at literature, but at preaching Christianity. However, because the *Bible* itself is a literary masterpiece, with its successful vernacular Chinese, it has, objectively, played a salutary and exemplary role in the birth of China's New Literature, which literary leaders such as Zhou Zuoren have acknowledg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New Literature, the image, language, spirit, and style of the *Bible* have all come to be embodied in many writers' works, thus providing some rich heterogenous resources for New Literature.

Key words: *The Combined Bible and the Bible in Mandarin Chinese*; New Literature; impact